



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

一支进步与合作力量？¹

牛海彬

2013年7月

- 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愈加活跃的外交活动，金砖国家对国际决策过程正在逐渐施加更大的影响。金砖国家间不断拓宽包含世界主要问题在内的合作议程。应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改革全球机制，将成为未来建立有效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美国和欧洲应当让渡一些权力给新兴国家，以推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金融资源。随着全球权力的日益分散，任何国际机制的改革都需要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的积极合作，否则终将一事无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和份额改革步伐缓慢，简直就是不进则退的退步。
- 国际社会应当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中给新兴国家提供非常任但长期和实质性的席位。此举是观察新兴国家表现的一种很好方式。安理会渐进的改变对其中的现有强国来说也同样是有益和美好的。
- 金砖国家间不断加深的合作正在带来更具实质性的制度性举措，比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些新的举措将给发展中世界带来新的资源、经验，以及新兴国家的优先议题，这些举措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
- 总而言之，秉持着合作共事的利益相关方心态，并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也许更有利于金砖国家去和平而且建设性地改造现有国际秩序。

1. 本文在“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一种进步力量？”基础之上修改，原文2012年4月发表于《视角/艾伯特基金会纽约办公室》(PERSPECTIVE | FES NEW YORK)。

1. 金砖国家重要吗？

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正越来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先由高盛公司于2001年提出，用以描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潜力。此后，“金砖国家”四个字得以广泛地运用，成为全球经济实力从发达国家转移至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象征。高盛公司预测，到2032年，金砖经济体的规模将与七国集团持平。² 2011年4月，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这个联合体的政治影响力及全球性质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新兴经济体”只是一个用以描述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力的一个理论性术语，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影响。无论是通过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思维和行为，还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经济力量转化成国际影响力，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考虑到金砖国家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本文将用“新兴国家”而非“新兴经济体”来指代金砖国家的多重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除俄罗斯之外，这些新兴国家均是在其历史上首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行为体。在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国际体系出现之前，中国的霸权影响力主要限于东亚地区。同样地，印度的传统势力也主要限于南亚地区。巴西和南非仅仅短暂地成为过地区霸主，其全球参与的经历十分有限。

作为地区性力量，这些国家意识到，仅凭其地区基础无法将影响力释放至全球层次。事实上，其地区领导权也经常受到域内竞争者和域外势力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除推进地区合作之外，多数

新兴国家奉行全球战略，以在促进区域合作的同时向外拓展自身。故此，新兴国家逐渐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展伙伴。但如果撇开经济成就的话，新兴国家在改变世界格局方面仍然十分乏力，因为他们作为全球行为体的经验和能力都相当有限。

过去十年来，金砖国家在参与世界事务方面愈加积极主动。从个体来说，金砖国家在其各自区域都是重要的地区行为体，维护着区域安全，并通过地区机制或者有时与域外主要对手合作来应对经济挑战。应对诸如像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海地的维和行动、洪都拉斯政变、南北苏丹分离等危机时的政治反应，证明了相关金砖国家发挥着协助性甚至是领导性的作用。从整体来说，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自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一直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着国际协商谈判；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就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促进非洲地区的发展而携手共进；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希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

这种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主动的姿态反映了新兴国家将其未来发展与国际体系、全球化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为给国内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并保护国家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金砖五国在探寻其成员内部经济机会和推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结成了共同体，其首要考虑就是改革当前的全球机制，若能成功，这些机制就可以用来保护金砖国家增长的体系利益并体现出他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和愿景。为了体现金砖国家全球治理中的高度参与性，本文将就以下内容进行分析：金砖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二十国集团和国际金融体系，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前景。

2. 奥尼尔和斯多尼茨卡 (Jim O'Neill and Anna Stupnytska), “金砖国家的长期展望与N-11后危机” (»The Long-Term Outlook for the BRICS and N-11 Post Crisis«), 《高盛全球经济报告第192号》(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92), 2009年12月4日, 第3页, 见于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brics-at-8/BRICS-doc.pdf>。

2. 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家保护责任”

所有金砖国家都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俄罗斯均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他金砖国家会经常地被选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事实上，2011年，所有金砖国家都在安理会内，其中大多数成员通过派出驻军、支持相关决议等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除去就和平问题合作外，金砖国家也将联合国视为进行维持和为重建和平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最合法组织，比如预防性军力部署和冲突后和平重建都是有关集体行动。金砖国家希望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事务已经从国际冲突延伸至国内动乱、全球流行病、跨国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由于联合国在应对国际安全事务方面的重要性，金砖国家试图为联合国提供更多有效资源或是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以期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金砖国家经常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不仅有助于这些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同时还锻炼了其军队的海外行动能力。巴西的决策者认为参与维和行动是成为制定规则的大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自1948年来，巴西派出军队参加了联合国约60次行动的一半。³ 印度派出了将近10万人的军队，参加了40多次任务。⁴ 印度同时还继续为联合国任务提供指挥官、训练来自不同国家的军官。中国参与的国际维和行动范围遍布全球，与其20世纪70年代一度不愿意支持任何维和行动的做法已有所不同。⁵ 南非在非洲国家当中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为联合国

在黎巴嫩、科特迪瓦和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提供了2200万美元的资金。⁶ 联合国共同行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鉴于七国集团逐渐减少军事和资金支持，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预算收紧的情况下，来自金砖国家的支持就尤其显得重要——无论是军事人员方面，还是财政支持方面。

随着各国国内冲突的增多，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的复杂性在上升。非洲大陆的内部冲突表现为政府与叛军、民兵组织之间的暴力武装叛乱，这给金砖国家的主权观造成了困境，尤其是当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外部干预的时候。金砖国家对待“国家保护责任”的态度是考量其维和决心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2005年，“国家保护责任”得到了所有联合国成员的认可，这个概念约定，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及反人类罪的侵害。如果一国不能够履行这一义务，或是有意不为之，国际社会就有责任介入，作为最后手段，联合国安理会可授权进行强制干预。总体来说，金砖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不愿意支持动武。这种谨慎态度也许来自于其曾是外来势力干涉受害者的历史，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对于“主权”概念有着严格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对西方国家滥用安理会决议的担忧体现在最近一次就利比亚和叙利亚所进行的投票上。然而，与其说金砖国家是在批评“国家保护责任”原则本身，不如说是在指责此次干预是由北约执行的。因此，为了防止未来在“国家保护责任”原则适用时对军事行动授权的滥用，巴西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准则。

尽管联合国奉行有关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但对新兴国家来说，接受“国家保护责任”这一原则比接受维和原则要难上许多。之所以新兴国家难以理解人权应高于主权，部分是因为他们曾被殖

3. “巴西与维和：政策而非利他主义” (»Brazil and Peacekeeping: Policy, not Altruism«),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2010年9月23日, 见于<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095626>。

4. 见于http://www.un.int/india/india_and_the_un_pkeeping.html。

5. 参见凌 (Bonny Ling), “中国的维和外交” (»China's Peacekeeping Diplomacy«), 《国际关系与制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07年第1期, 第47页。

6. 见于<http://english.ruvr.ru/2011/10/29/59547139.html>。

民的历史，部分是因为这些崛起的力量在国际社会中无意扮演侵略性角色。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国际诉求和海外既得利益，新兴国家需要在两方面对“国家保护责任”重新思考。一是，过于谨慎的态度或是“不合作”的行为也许会影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可能。西方国家会认为安理会改革之后，新增的金砖国家成员将让达成决议变得更加艰难，这会让守成大国不希望永久容纳这些新兴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内。二是，新兴国家不断增加的海外利益使得他们很难避免与适用“国家保护责任”的国家开展交往。新兴国家正成为多数需要维和行动的区域的主要投资者和进出口商。例如，中国和印度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石油进口国，同时也是主要的物资出口商。阿拉伯-南美峰会证实了该地区对巴西的重要性。这些更广泛的利益也许会为新兴国家履行其基于新增利益之上的责任而创造机会。金砖国家以后有关“国家保护责任”的决定因此会更加务实、更受利益而非意识形态驱动。

3.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由于反映的是1945年而非今日的世界格局，联合国安理会常常受到批评。安理会越来越滞后于时代，无法体现全球权力的转移，至今都没有永久性地纳入一个非洲或拉美国家成为其成员。因此，改革安理会成了联合国改革的一项核心议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率领成立了一个高级小组，提出两项改革安理会的建议。计划一是让印度、日本、巴西、德国和两个非洲国家成为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计划二是安理会采用轮值理事国方式而不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由于地区集团反对，加之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愿推动真正的改革，上述计划无一能够获得足够支持。没有美国的有力推动、必要的地区共识，以及对全球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胁，改革安理会似乎举步维艰。尽管金砖国家里的非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和日本可以赢得联合国大会三分

之二票数，决议仍需要所有成员国中三分之二国家的国内立法加以通过，包括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地区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长，各国因不同议题而组成不同的联合体，这些都使得改革安理会构成、让其更有效很有必要。总体来说，金砖五国是安理会改革的相关集团，其中两国中国和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其他三国则是未来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候选者。所有金砖国家都认同联合国需要全面的改革，包括使安理会更有影响力、更有效率并更具代表性。第一轮金砖国家峰会后，尽管中国、俄罗斯支持巴西、印度和南非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但并不明确支持这三个国家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内部若能形成一个清晰、统一、坚定的支持立场，则必然会改变联合国改革中的动力关系。

对西方守成大国而言，其最大的担心是新兴国家在安理会获得常任席位后会带来不确定性。尽管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是民主政体，但其应对国际事务的方式却更接近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如前所述，新兴国家不愿意使用联合国强制性权力来捍卫国际规范。比如，有人担心印度会将其不结盟那套说辞引入安理会。⁷ 相反地，由于其在种族隔离期间激进的应对方式和谋求非洲领导权的企图，南非在处理由于外部干预引发的地区不稳定时非常谨慎，偏向地区事务在区域内进行解决。巴西与土耳其在2010年试图调停伊朗核危机的努力并不为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所欣赏。巴西与其他金砖国家联手就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进行的投票也让西方国家印象不佳。在利比亚问题形成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后，金砖国家已联合起来，无视西方强国的意图，希望避免在叙利亚问题上重蹈覆辙。有关保护军事冲突中的平民和“国家

7. 帕特里克和巴塔查基 (Stewart Patrick and Preeti Bhattacharji), “崛起的印度：对世界秩序与国际体制的影响” (»Rising India: Implications for World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见于<http://www.cfr.org/projects/world/rising-india-implications-for-world-order-and-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pr1545>。

保护责任”原则的讨论反映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的矛盾，也使得守成大国愈发不情愿推动安理会改革。

有人认为，在讨论联合国未来发展时应当摒弃单个“金砖国家”集团的概念。⁸ 依据这种推论，存在着三种权力层次。美国所处的层次偏好直接行动。第二个层次由安理会其余四国构成，这些国家对联合国改革抱有疑虑，害怕自身影响力受到稀释。第三个层次则是广大“贫民”，包括半数金砖国家。对他们而言，安理会扩充能带来地位、影响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几乎不需肩负任何实际责任或是履行承诺，因为他们并未准备好在海外履行大国职责。安理会改革的复杂性愈加显现。如果没有基于相似理念、行为模式和共同利益的互信，安理会的实质性改革就无法实现。金砖国家内部形成的政治统一远远低于其欲推动联合国体系改革之所需。由于中印之间存在达赖喇嘛和边界问题，这使得两国在印度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过程更加复杂化。⁹

4. 二十国集团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二十国集团的演变体现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管理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二十国集团峰会是首个其结构能基本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国际平台，参与峰会的国家贡献了85%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¹⁰ 1999年亚

洲金融危机时，新兴国家的财政部长最初为应对危机建立了这个机制。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和巴西的推动下，二十国集团会议提升到峰会级别。二十国集团峰会并不仅仅要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还要通过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管理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首次金砖国家峰会召开，那次峰会着眼于如何理解危机，如何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携手合作以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峰会的主要成果是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复苏计划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金砖国家在这两方面都有贡献。如同巴西一样，中国发布令人瞩目的国内刺激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久以来的债务国成为主要出资者。作为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委员会同意将部分投票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诸如像金融稳定理事会里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动议权、财政管理政策、互相评估机制以及发展日程的治理行为，都与新兴经济体未来发展和关切紧密相关。

因为与世界经济体系不断融合，金砖国家在所有这些机构里都增加了自身的合法性，都是各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里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国。俄罗斯新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许会增加俄罗斯的经济筹码——俄罗斯的经济力量相对较弱，其政治优势大部分来自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对于欧洲和亚洲的影响。中国和巴西是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配额增加的主要债券购买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份额分别从2008年的3.996%、2.442%、2.494%和1.783%增长至6.394%、2.751%、2.706%和2.316%。通过减少两名欧洲国家成员、选举而非指定所有成员，董事会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并使欧洲国家的特权趋于最小化。

8. 参见埃肯伯利和赖特 (G. John Ikenberry & Thomas Wright), “崛起的国家与国际体制”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世纪基金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08年, 第1-34页。

9. 参见潘达 (Jagannath P. Panda): “北京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看法: 身份、行动主义与战略” (»Beijing's Perspective on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Identity, Activism and Strategy«), 《葡萄牙国际关系学刊》 (Portugu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年春夏刊, 第24-36页。

10. 佐立克 (Robert B. Zoellick), “关于二十国集团的五个神话” (»Five Myths about the G-20«), 《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2011年10月28日。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金砖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面对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这些外汇储备贬值，新兴国家建议，应当改进特别提款权的现状并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¹¹ 从金砖国家角度来看，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首先，国际储存货币多样化进程应当加速，理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当前迫切所需。其次，全球收支失衡是金砖国家的重大关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当前新兴市场的经常账户盈余增加，而作为新兴市场投资目标地的美国，其经常账户赤字却在不断增长。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欧洲国家等少数几个国家控制。遴选高级管理者的机制并不透明，而甄选标准也是基于国籍而非专业经验。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用的资金来源有限，以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换取投票权改革措施十分必要。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增强其规范和监管国际金融市场的职能，借以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二十国集团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都在极力防止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主要经济体都在支持着这些机构发挥作用。然而，为了获得特殊的利益和影响力，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内还是在其他相关机构里，各主要经济体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美国等主要强国不得不确保全球系统不致崩溃，但是在这个系统内一些国家也受到驱动在争取政治和经济收益。¹² 美国和欧洲应当让渡一些权力给新兴经济体，以换取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注资。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分散，如果没有现有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积极合作，任何国际体制的改革都无法进行。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关者愈加不愿支持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这

11. 特别提款权是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始用于补充各成员国的官方储备补充。其价值取决于四种主要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可用于交换获得自由使用的货币。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特别提款权可以作为超主权的储备货币。

12. 琼斯 (Bruce Jones), “集团之后：西方、新兴国家和基于利益的国际合作” (»Beyond Blocs: The West, Rising Powers and Interest-bas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政策分析简报》 (Policy Analysis Brief), 2011年10月, 斯坦利基金 (The Stanley Foundation)。

样的退步可能会减少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动力。

5.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前景

2013年3月27日第五次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举行，主题是“金砖国家与南非：合作谋发展、团结和工业化”。此次峰会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成功完成了第一轮金砖国家峰会，同时还因为这次峰会形成了广泛的议程和通过了一些制度性、实质性的决议。其中，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最为世人瞩目。这项提议最早形成于金砖国家印度峰会期间。经过为期一年对银行可行性和潜力的考察后，第五次金砖峰会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虽然银行总部、行长、初始融资和拨款尚未决定，峰会声明显示，银行的初始融资是充足的，足以使银行的基础设施融资有效地运作起来。

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谋求国际发展的一部分，也反映了其在谋求国家发展时的首要考虑。就目前情况来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对金砖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地区缺乏足够的长期资助和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股本的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世界银行借贷政策的首要考量。非洲国家还希望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投向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在此情况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运用金砖国家增长的金融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如何，不仅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作为新成立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既需要从世界银行汲取大量经验，也需要促使世界银行重新思考其对国际发展的政策。有观察者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会有竞争，原因在于，

相较于传统的华盛顿系统的机构，新兴市场的机构有能力以更少条件借贷出更多资本。¹³ 无论这两家银行关系如何，金砖国家发展银行都将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金融支持，这对于改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是个积极推动。毕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意味着未来对发展的坚实投资。¹⁴

6. 结论

由于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金砖国家必将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第五次金砖国家峰会的议题几乎包括了当下所有主要议题：国际安全、发展问题、世界经济和人权问题等。这不仅来自国际社会的期望，同时也符合金砖国家自身的利益，即提高国际地位和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金砖国家主要依靠目前的国际机制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这些机制多数依然为西方强国所把持。新兴国家真正融入这个体系需要互相的、逐渐的适应过程。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秉持合作的精神，摒弃零和游戏和封锁思维，并采取务实的手段。

当前全球治理结构主要由西方国家创建和领导，新兴国家应当利用自身共同的影响力来重塑国际体系以反映自身关切。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举行让老旧的八国集团带来的不平等的和特设性失去活力。金砖国家峰会为新兴国家搭起新的平台，让这些愿意并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集体作用的国家联合在一起。新兴国家共同寻求的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个秩序应当建立在多极、公正、公平和民主的原则之上。新兴国家作

为当前国际体系有影响力的成员，希望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这个结构能反映出它们的想法和利益。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新兴国家联手可令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具有代表性、更加富有效率。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并非意在抗衡西方守成大国，而是寻求与它们更加有效或平等的对话，为人类建立更合理的世界秩序。

金砖国家对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或是维持西方秩序的伙伴仍然十分谨慎。¹⁵ 新兴国家对人道主义干涉、金融自由化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政策十分抵触，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援助附加条件。发达国家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迟缓的行动也减少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意愿。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故而，如果西方国家认为金砖国家是阻碍力量而非进步力量，这也情有可原。实际上，西方不愿配合改革当前国际机制，这也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至于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可以推动五个常任理事国提供两至三个长期轮值席位让新兴国家进入安理会，这些席位对所有国家开放，每六年改选一次，这也不失是预判其在拥有更稳固席位后行为绩效的好方法。

13. 乔治 (Samuel George): “金砖国家添砖加瓦：构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替代品” (»BRIC by BRIC: Building an Alternative to Bretton Woods Development«), 《博茨曼基金报告》(Bertelsmann Foundation Report), 2013年4月4日。

14. 拿加拉 (Bunn Nagara): “金砖银行：实施不同的发展?” (»BRICS Bank: Doing Development Differently?«), 《南方视点》(South Views), 第59期, 2013年4月12日。

15. 罗伯茨 (Cynthia Roberts), “金砖国家添砖加瓦建立世界新秩序” (»Building the New World Order BRIC by BRIC«), 《欧洲金融评论》(Th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2011年2、3月, 第8页。



关于作者

牛海彬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助理、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Imprin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Hiroshimastr. 28 | 10785 Berlin | Germany

Responsible:
Catrina Schläger | Resident Director FES Shanghai
Hubert René Schillinger | Coordinator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Phone ++49-30-269-25-7415 | Fax: ++49-30-269-35-9246
<http://www.fes.de/GPol/en>

To order publications:
Sandra.Richter@fes.de

Commercial use of all media publish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not permitt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FES.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department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osters dialogu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promotes public and political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discussions and consultation we aim at raising awareness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ies, developing scenarios for future trends and formula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publication is part of the working lin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charge: Hubert René Schillinger, Hubert.Schillinger@fes.de.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contributes worldwide to the debate o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t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 through an inclusive and responsive global policy approach – globalization can be shaped into a direction that promotes peace,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The program draws intens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a German non-profit institution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democracy with offices, programs and partner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addresses »movers and shakers« bo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 the industrialized parts of the world. The program is coordinated by the head offic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 Berlin and by the FES offices in New York and Geneva.

本文观点不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立场。